



刘鹏称得上是晚清时代的异才、奇才、乃至通才。

然而,我们在查考历史资料时,却发现天荒地现这么一个奇特的现象:刘鹏虽然拥有较为全面的才识,却似乎很难找到一个确定的可以称之为老师的人。

如果说有,那只能是他的塾师赵君举先生。此人虽不得志,却学问渊博。此事可见之于刘鹏的嫡孙刘蕙孙先生在《铁云先生年谱长编》中的一段文字:“同治二年,甲子,公元1864年,八岁。仍随父任在汝宁府衙中,从同邑赵君举先生读书。”刘鹏之子刘大绅先生也在《关于老残游记·七》一文中写过类似的话:“稍长,从同邑赵君举读,过目成诵,惟不喜制艺。”

无疑,刘鹏是绝顶聪明的。在同一篇文章中,刘大绅还提到:“先君(指刘鹏)生而奇崛颖悟绝人。初从姊(指刘鹏二姊素琴)识字,未久即能背诵唐诗三百首。”刘鹏在他44岁见到4岁时在二姐指点下读《唐诗三百首》一书时,禁不住感慨万千,随即写下了“阿姊停针每见怜,小时指授绣灯前”的诗句。

除了两份史料以外,除了可以看到他9岁时随父刘成忠从汝宁府调任开封府,15岁随父到河南南汝光道的记载外,我们再也无法从史料中找到刘鹏再师从过什么人。倒是在20岁时,回原籍参加南京乡试落第后回到淮安,继而去扬州谒见太谷学派的传人李龙川,相隔四年后,转资从龙川先生,接受太谷学派的教义,并成了李龙川先生最年轻且最得意的门生。

其实到了这个时候,也就是说,到了他20岁光景,刘鹏已经成为一位饱读诗书的士子了。不过,他的兴趣根本不在“子曰诗云”,他选择的人生之路也不是什么科举致仕,而是“经世之学”。可以说,从他20岁开始,自从谒见太

刘鹏的自学与治学

许文金

谷学派的传人李龙川之后,他的人生观、世界观已发生了质的变化。所谓“经世之学”,这正是太谷学派的教义所在,规范门弟子成为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,德才兼备的全面人才。从20岁开始,他一度潜心于家学当中。乃父刘成忠是个治河能手,著有《河工刍议》,提倡“筑堤束水,束水攻沙”及“堤不如埝,埝不如坝”之类的创见,但如何施用到具体实践中则又是另一回事了。到了刘鹏的手里,他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,以致12年后,他胸有成竹敢于主动请缨,去投效黄河河工。那一年,黄河在河南郑州缺口,致使大片地区成了水乡泽国,数十万人不是死于非命,就是无家可归,以致饿殍遍地。朝廷处理了一大批治河官员。刘鹏就是在这样的危急关头,投效了黄河河工的治理,首战告捷,很快治愈了河患,因此而一炮走红,声震朝野,以致被朝廷“以知府任用”而声誉鹊起。

如果说,河工之学有一部分是受用于“家学”,那么,数学领域的才能又师从何来呢?情况是这样的:在他23岁的时候,刘鹏开始“究心勾股、开方等数学问题,注意西洋绘图工具,曾一度出门,岁暮方归。”乃兄刘味青先生的遗作为此提供了证据,他在《阅历琐记》中这样写道:“辛卯(1879年)十一月二十二日,策弟(指刘鹏)向晚抵家,携有长江图,洋人用新法所绘,用石印法印出。”二十三日又记:“早起,云转(仍指刘鹏)至房,见其所购洋人诸笔,铅笔一枝,铁镊笔(大概圆规之类)一枝,铁镊笔专为画线之用。其端甚薄,上有螺丝,螺丝进则所画线甚细退则粗,法至巧也。”这一年,刘鹏出了远门,以致“至岁暮方归”。不管怎么说,刘鹏对数学的研究是有成果的,而且深谙其要。以致不久就写出了诸如《弧角三术》及《勾股天元草》之类的数学专著。

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刘鹏的兴趣是广泛的。在他31岁时,“在京都无事,就向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松本文三郎及某英人学英文,又去听西洋哲学的课。”(刘鹏后人语)

刘鹏才具的形成,完全是依靠自学。在此,我们还可以从山东巡抚福润的奏片作为佐证:“再候选同知刘鹏……经前抚臣张曜咨调来东,委办河务,该员向习算学河工,并谙机器、

船械、水学、力学、电学等事,著有《勾股天元草》《弧角三术》《历代黄河变迁图考》等书。其所著各书,考据尚属详明,有益实用。查该员学术渊源,通晓洋务,合无仰恳天恩,准由奴才将该员刘鹏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验,以备任使之处。”一个巡抚写给皇帝的奏折可不是随便乱说的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,刘鹏的真才实学已被山东巡抚福润这位仁兄看中,他在奏片中对刘鹏是十分推崇的。刘鹏赖有这位仁兄前后两次的“以奇才荐”,所以刘鹏才得以“以知府用”,福润确实也没看错人!

刘鹏从1876年到1895年这20多年间,除了开烟店,行医,创办民族工商业一系列活动外,都是在忙余依靠自学而不断地如饥似渴地获取各种知识,以致具备跨学科、跨领域的真知灼见和多种才能。

刘鹏不仅勤奋地自学,还在治学方面力见其精。仅举几例足以印证他治学的刻苦严谨和精益求精。

第一,是对甲骨文的考释。当年,他收罗的甲骨数量之巨,堪称独步天下,竟达5000片之多。他在《铁云藏龟·自序》中说:“综计予之所藏约过5000片,已竟一坑所出。虽不敢云尽在于此,其遗亦仅矣!”他收藏甲骨的目的就是为了考释古老的“三代文字”。他破释了相当一部分甲骨文字,开了中国研究甲骨文的先河。他的这些活动,在《壬寅日记》以及诗词中不时可见。虽然之后有了孙毓让、罗振玉、王国维等辈的成果,但这些大家的成就都是建立在刘鹏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的。他们只是步了刘鹏的后尘。甲骨起初被当成一味中药来看待的,称之为“龙骨”;一个偶然的机会,刘鹏在别人倒掉的药渣中发现这种“龙骨”上隐隐有字,他一机灵,竟发现这是国宝!如果没有刘鹏的慧眼识宝,中国的甲骨学很可能是一片荒芜。

第二,关于《老残游记》的创作。如今,这已成为世界公认的五大成就之一。“他的治黄工程,开采山西煤矿,赈济北京灾民,发现甲骨文和写作《老残游记》,其中任何一项,足以引起自豪”。《老残游记》被鲁迅先生列为中国四大讽刺小说之一,评价为“写景状物,时有可观”,《明湖居听书》,黄河打冰,巧姑的心理活动描写,在文学描写中一扫中国文学陈腐的气息,



同样开了文学描写形神兼备的先河。如果刘鹏不好好地治学,就很难产生这样的佳制。

第三,是对音乐的钻研。到了49岁这把年纪,刘鹏还对音乐情有独钟。他开始师从国手劳泮颖、张瑞珊,不长的时间内,即能将琵琶弹奏到得心应手,如行云流水。他当年在小楼前弹奏的古琴曲《平沙落雁》,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。他对乐理也十分在行,对古琴曲的评说也十分到位,这些真知灼见,从他为张瑞珊所作的《十一弦馆琴谱序》中可以得到印证。

第四,是对医学的钻研。当他被流放到新疆的迪化(今乌鲁木齐)时,居然搁置个人的不幸,倒一门心思扑到医学领域中去,从而写出了《人寿安和集》,虽然因天不假年,没能完成,但从遗世的资料中可以看出,他在临床方面有独到的见解。《人寿安和集》的产生,正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。

刘鹏的治学精神是难能可贵的,也是常人难以企及的。一个人要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,光靠天赋是不够的,要靠非凡的毅力和精益求精的精神,要靠那种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

得人憔悴”的锲而不舍的执着追求。刘鹏的这种精神,还可以从他的诗句中得到体现。他在《遣兴》诗中写道:“终日摩挲上古铜,有时闲坐味无穷。窗前树影偷遮日,屋内花香不借风,读画夜深鱼灯冷,校碑昼永蜡灯红。”你看,为了专研古董,居然废寝忘食,夜以继日了。他在《自嘲》中还写道:“铁公好古如好色,鉴赏宽容笑深刻。”一个“笑”字,道出了在钻研之路上自足自乐的盎然之兴。

刘鹏靠自学和治学得以成才,还表现出一个独特的亮点,是要大书而特书的。那就是:不管他工作多么繁忙,头绪多么复杂,甚至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,都无法动摇他治学态度。试想,作为一个旧时代的普通知识分子,能够自觉的凭自学和治学把自己打造成为超凡脱俗的人才,实属不易;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,尚且能抱定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目标而不懈奋斗,书写出自己的灿烂人生。

刘鹏在自学与治学方面所留下的风范,确实可以成为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淮安琐记

李浩

在三五年的时间里,我已经数次来过淮安。我曾在这数次的到来之中走进它的各个“局部”,这些局部给了我一个尚有许多缺口,但已经具备了某种面目感的拼图。

然而,我还是愿意“想象”一个淮安,一个坐落在历史时间节点中的淮安,一个处在细雨蒙蒙中的淮安。运河之水流淌得安静但浩荡,漕运如同这个庞大帝国的血管,那时,“火车”还是一个不存在的名词,行走于官道上的只有马车、牛车或者是人的双腿……我愿意“想象”一个淮安,繁华甚至有些喧嚣的淮安,一个充满着浑浊多样的市声与日常琐碎的淮安。

水流带来了财富和粮食的气息,以及菜蔬与脂粉混合的香。运来了石料,它们被用作建筑、雕刻、台阶,向上或者向下,它们象征着某种的不朽,磨损得很慢。当然,也运来了书籍和想象,这在城市的建设之中从不可或缺,从一否则,它就不存在沉积。我想象那时的淮安是一座生机和落寞并存的城市,是一座阳光和阴雨在一日内即可转换数次的城市,从船上下来,纸伞并不能遮住全部的雨,鞋子会在不经意间踩到水滴上。我想象一队士兵擎着长矛,从码头上整齐走过,他们一起忽略着落在身上的雨点,仿佛落下来的只是阳光,或者是柳叶。我想象铜锣的声响以及一片隐在远处的呼喊:那些穿着官服的人来至码头,他们朝着流水的远处张望,因为距离甚远我无法从模糊的表情中看出他们是兴奋、忐忑还是期盼……

数次来到淮安,我承认自己不止一次这样想象过,想象自己是一个古人,想象自己顺着流水和石阶,走进过往时间的某个深处。在淮安,在我到过的那些属于它的局部,我觉得它足以让我的想象建立起这样的支撑,足以。走在具有古老痕迹的石阶上、石板路上,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有根的人。

古老和现代并存,在淮安,有风吹雨打去的繁华也有此时崭新的繁华,它们有时会有一条共用的街,有时会被隔在道路的两旁,需要一个拐角。在我的感觉中,它是少有的古时和今时可以共通的城市,古时和今时拥有相近



的呼吸。旅行车停靠在淮安府衙门前的广场,那些现代的旅行者从各自的车上鱼贯而下,手机喧响,他们在电话里谈论时间、经历、生意、财富和生活,有些话题是亘古的,而有些话题则只属于当下。广场,这一片区域分明地属于现在,是水泥筑就的区域,而一旦行至淮安府署,向内,时间如同是被悄然掀开的帘,空气里竟然也充盈出了“旧日”气息。仿佛,我们走进了旧时间的里面,那里的一花一木、一屋一阁、一棹一柱,都带着强烈的古典性,而这份古典性又是活的,有生长,有生机,甚至有气息。

在这份古典性的里面,唯独缺少了的是旧人。我想象那些经历跋涉来至淮安的知府——在旧日,他即使骑在快马之上,和现在相比也应是某种的慢生活,没有一辆马车,一艘船能有现在的飞机与火车的时速,他们的到达必须经历些跋涉、颠簸,即使他们的心可以早早地奔驰而至。那位知府,他在前前后后的簇拥、摇摇晃晃起伏伏的笑脸中,是否会真切而用心地回一下头,回望一下牌楼后面的《御制戒石铭》:尔奉尔禄,民膏民脂,下民易虐,上天难欺?他,是否会在前前后后的簇拥、起伏伏的笑脸中停下脚步,在细雨中,或者在灼人的夏日之下,与那些簇拥的笑脸们一起品味悬于正门处的楹联:

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;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?

其中当然有滋味,历久不散。只是,当年那些貌似小心翼翼的仆役们,是否同样小心翼翼地擦拭了落在上面的尘土?而那位怀揣着个人心思的知府,是否真正注意到了其中的每一个字词?

府署旧着,在时光里缓缓地旧着,但院子里的草与花不旧,那些新生的树叶不旧,上面的天空也不旧。在这份古典里面,唯独缺少了的是旧人,我只能依靠猜度来完成:那一刻,当新任的知府来到淮安,他是兴奋喜悦还是生出了战战兢兢?他是意气风发,还是……

我不是他,不是那个旧人。我的猜度和想象都如同是在风中捕捉到的影子。当然,任何的感慨和呼吁都是今日的,可我还是愿意伸手去捕捉。

因为淮安,有历史和传说的淮安,遗存与现代同在、确信与幻想同在的淮安,给了我这样的支点。

三

淮安,因为漕运,自古繁华。旧着的府署也依然能够透出某些的繁华之气,尽管它已经刻意内敛,尽量简朴,这也符合旧时中国的审美,这审美,多少让人怀念。

可以令人怀念的还有运河,是的,它曾是血脉,给予的不只是一个淮安,更重要的是它让偌大的国家南北有了所需要的输送。假如没有这条血脉一般珍贵而重要的运河,那些同质文明的因子是否还会沿流水的输与送而渗透

到全国的各地?在漕运博物馆,这一怀念或许可算是有一具体的着落,我的眼前有千帆经过,而流水渐远。

还有石码头。还有灯红的花街。还有水流中的船,夹岸的垂柳和湿漉漉的菖蒲,它的叶子上沾满了细细的水汽。还有虚构与传说,放置于俚语中的故事,等等。还有,那些僻静处的日常,和他们的劳作。那些处在褶皱中的背石头用的绳索,防水的雨鞋,铁块烧红时的击打声,孩子的哭闹,高过了塔尖转瞬即逝的烟火,那些吱吱呀呀吃力走过的车,倒在尘土里的污水,溅到裤腿上的泥渍,铁链和石板摩擦而过的喧响……

我还怀念小巷里的书声,那时候,他们更愿意把每一个字都读出声来,一盘一盘的,敲打着盘壁而破碎掉的珠子便是收获。我怀念那时候商铺们挂在门口之上的幌旗,它们同样低调内敛,少有吹嘘的成分。我承认来至淮安,突然间我的怀念就变得过多。

淮安,有着怀念的多个角度,它延伸向种种的不同。我以为,它也从这里获得了不同的重量。

五

运送着粮、米、盐、瓷器、瓜果、女红、金钱、梦想和信函的船也会运送来种种美食,它们在这里交汇,并生出新的特色。

它交汇、洗涤、取舍、改造,成为了现在。在淮安,舌尖上确有一种美妙而经得起回味的中国。

很中国:它们口味清鲜却又平和,不瞬惊艳却耐得品嚼。它不咸,不淡,以本味取胜,做工细致但无丝毫的炫目与张扬。无论是软兜长鱼、蟹粉狮子头、平桥豆腐……都是我想象的中国的样子,美食的样子,甚至更佳。数次来到淮安,我承认,部分是因为美食。淮扬菜,它的诱惑也同样清鲜而又平和,你需要调动自己的味蕾去感受,感受那种的不可抗拒。不过,我没有想过抗拒,我只是愿意一而再、再而三,并且把这种味道将错就错地,认作故乡。

运送着粮、米、盐、瓷器、瓜果、女红、金钱、梦想和信函的船往往也会运送更为宽阔博大而奇诡的想象,它会取让经的故事、冒险的故事、颠簸的故事在想象中发酵,而落在白纸上。白纸上,自然可以生出云烟,生出以石头为骨骼的猴子,生出一个水帘背后的山洞。但那座满是花与果的猴山只是“故乡”,不可沉溺与久居。

就像没有一个人会久居于童年一样。

淮安府署的存在与吴承恩故居的存在分列于历史的两个“区域”,府署属于庄严、正统、具体、规矩,即使体恤和悲悯也是透着庄严在,是一种向下;而吴承恩所赋予淮安的,则是幻想、民间、游戏、不羁,以及抗争之心。它们共存于运河的这一隅,我相信它们的影响也一定是潜隐却深入的。它们有巨大的可能融进淮安人的性格中。在某种程度上,随着贯通的运河,随着输送,整个民族的性格因素都会受到它们的影响——不是吗?假如,我们拥有一面可以内视的镜子。

两种象征,两种不同,几乎是反方向的。然而它们并存着,不悖地并存着。淮安这一地域有着极为良好的容纳。那,在它们之间,会不会有相互轻视或敌视的时候?在一个人的心里,身上,这两种不同又是如何共存的?

“伏怪以力;取经唯诚。”吴氏故居里一副肖娴所书的对联,我发现,很多人都曾对它注视良久。

